

哈萨克斯坦的国族建构

——以科恩双重民族主义为路径的分析

张 哲

本文梳理了汉斯·科恩(Hans Kohn)开创的民族主义二分法,并以此为理论出发点,分析了哈萨克斯坦在面临国族建构困境时,在两种路径之间的摇摆与探索。公民/族裔的二分法可能为探索民族主义机制提供有启发、有价值的视角,却也存在西方中心主义的道德缺陷和时代局限。作为“理想型”的二分法在政治实践中的区分度很低,很难成为不同国家国族建构的分类标准;不论西方或东方,当面临族裔与公民的两难困境时,国家常常不得不使用模糊策略,在公民/族裔的民族主义之间维持谨慎的平衡,以随时应对不同时期的内政外交挑战。

关键词:国族建构 族裔民族主义 公民民族主义 哈萨克斯坦

作者张哲,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地址:北京市,邮编100087。

一、引言

早在1991年哈萨克斯坦宣布独立、成为民族国家世界格局中的新成员时,该国就面临着国族建构(nation-building)^①的艰难挑战:该国的主体族群哈萨克族占总人口比例不高、哈萨克语的使用程度不够普及,俄罗斯族人口集中聚居在北部经济较发达、与俄罗斯接壤地区,甚至分离主义思潮也间或出现。这个面临重重困难的新生民族国家,是如何开展其国族建构的?

本文用汉斯·科恩开创的民族主义二分法对其国族建构的道路进行分析。在科恩的理论中,“族裔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常常诉诸共同的血缘与文化,而“公民民族主义”(civic nationalism)的支持者则主张以社会契约、法律信条和价值原则作为建构民族共同体的根基。本文聚焦哈萨克斯坦这一案例,剖析科恩的二分法对我们理解民族主义产生了哪些深刻的影响,并重新审视这种理论的价值与缺陷。哈萨克斯坦在两种国族建构的路径中摇摆,并试图维持一种微妙的平衡与模糊性的策略:一方面,哈萨克斯坦实施以族裔认同为主导的“文化路径”,推广族裔性质的“哈萨克人认同”(Kazakh identity),通过在语言、节庆、文化等传统领

^① 本文聚焦的“国族”对应英文中的“nation”,专指民族国家层面的“国家民族”(state-nation)。本文其他部分的“民族”,除非特别说明,也指“国家民族”而非民族国家内部的族类共同体(本文中的“族群”)。在“国族建构”提法之外,按惯常中文译法,本文仍将英文的“nation”“nationalism”写作“民族”“民族主义”。

域的“哈萨克化”赋予主体人群优先地位,并实施大刀阔斧的移民政策以改变本国人口结构。另一方面,该国实施了以公民身份认同为主导的“政治路径”,推广公民性质的“哈萨克斯坦人认同”(Kazakhstani identity),要求从法理上认定哈萨克斯坦是各族公民的“共同家园”,强调各族公民的公民权与人权,反对族群自治、反对以族群为单位的少数民族政治诉求,并坚定地建设单一制国家,反对联邦制和民族自决。

与前南斯拉夫、乌克兰等苏东地区走上独立的国家相比,哈萨克斯坦的国族建构相对成功,哈萨克族从人口结构、语言使用、政治代表性等方面都逐渐呈现出主导趋势,且迄今并未引发重大的族群冲突和分离主义运动。但必须指出,该国的国族建构还未能高枕无忧。现实中“哈萨克人”和“哈萨克斯坦人”的认同两难带来了诸多矛盾和冲突。随着哈萨克斯坦国家(state)的“哈萨克化”,主体人群哈萨克族的族裔民族主义日益高涨,越来越频繁地反对“哈萨克斯坦人认同”,反对“各族群不论大小一律平等”等提法,甚至要求将国名由“哈萨克斯坦共和国”(Republic of Kazakhstan)改为“哈萨克共和国”(Kazakh Republic)。这种情绪在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双边关系日益紧张、俄罗斯政客不断出言威胁哈国领土主权的情况下尤其危险,极易引发哈萨克族与最大的少数民族俄罗斯族之间的冲突。对于少数族裔,尤其是俄罗斯人而言,也能清晰地感受到哈萨克斯坦的国族建设中族裔民族主义的路径日益占据上风,“哈萨克斯坦人”(Kazakhstani)公民认同的包容性日益收窄,随着文字改革等一系列文化政策的实施,少数族裔的抵触情绪也在升温。可以说,哈萨克斯坦是一个仍在民族化的国家(nationalizing state),其“想象的共同体”建构尚未完成,仍存在相当的族群冲突,甚至分离主义风险。

总而言之,本文通过科恩开创的民族主义二分法剖析哈萨克斯坦的国族建构,进一步论证国族建构是一种动态、进行中的过程;它不但很难一蹴而就,其路径也并非恒常不变,而是要因应现实需求不断调整。本文首先归纳、梳理科恩的民族主义二分法理论,接下来以哈萨克斯坦为案例进行实证分析,随后再对相关理论做出批评、讨论和丰富,并进行简短的总结陈述。

二、科恩的民族主义二分法

1. 二分法的历史脉络。在汉斯·科恩一系列有关民族主义的著作发表后,不论在以时间为顺序的分类,还是类型学的区分中,民族主义似乎总是作为拥有“族裔”和“公民”两幅面孔的雅努斯(Janus)浮出水面。^①究其来源,这种二分法的类型学与科恩的生活经历,以及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国际政治氛围息息相关。^②

1891年,科恩出生于布拉格的一个犹太家庭,以捷克语和德语为双母语,在布拉格获得法律和政治学博士学位。他在青年时曾加入犹太复国组织,并在一战中参军,被俄军俘虏后囚禁

^① Brian Porter, "Beyond the Study of Nationalism," in T. Kamusella, K. Jaskulowski eds., *Nationalism Today*, Oxford—Bern: Peter Lang, 2009, p. 3.

^② Noam Pianko, "Did Kohn Believe in the 'Kohn Dichotomy'? Reconsidering Kohn's Journey From The Political Idea of Judaism to The Idea of Nationalism," *Leo Baeck Institute Year Book*, Vol. 55, p. 311, 2010; Adi Gordon, "The Need for West: Hans Kohn and the North Atlantic Communit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 46, No. 1, 2011.

于撒马尔罕等地；获释后他曾短暂在巴黎、伦敦和耶路撒冷生活，并最终于1934年移民美国。^①在美十年后，他发表了自己最重要的、影响深远的学术作品《民族主义的思想》。^②在这本书中，科恩确立了一种被广泛传播和讨论的民族主义二分法。尽管科恩的论述具有重要的影响和创新，但此前也有学者提出过类似的论述。例如，德国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迈内克(Friedrich Meinecke)在其1908年的著作《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中区别了“国家民族”(Staatsnation)与“文化民族”(Kulturnation)，前者指由国家的政治力量构建的民族，而后者指由于文化语言独特性而存在的民族。再向前追溯，在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以及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中均有出现。例如，马恩将民族国家分为“有历史的”“先进的”和“无历史的”“落后的”。^③比利时学者德·拉弗莱(Emile de Laveleye)在1868年的作品中就提出，一种民族依赖于血缘和出身，是落后的、治理不善的、受压迫的民族，其民族主义诞生于民族语言的狂热者对过去苦难与荣耀的讲述；另一种民族依赖于智识(intellect)，是选举的、政治的民族，其民族主义来源于对自由的热爱、利益的和谐和构成理性生活的相似性。^④

尽管没有一种简单的、线性的知识谱系可以追溯，但科恩可能从不同学者的理论中得到过启发。相对清晰的是，从科恩开始，这种民族主义的二分法获得了更为广泛的传播和影响力。原因之一是，在二战和冷战期间的政治氛围中，民族主义二分法的清晰规范性带来了特殊的政治意义。在科恩的定义中，西方的、公民的民族主义与西欧地区开放、包容的自由主义传统相关，而非西方的、族裔的民族主义则由于与法西斯主义的关联而被打上了危险、狭隘、暴力、狂热的道德烙印。在法西斯主义之外，学者们也倾向于将斯拉夫世界和广大亚非拉地区的民族作为“非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继承人，与西欧的自由民族主义相对立。^⑤冷战结束后，这种二分法又在以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为代表的文明冲突论者中得到了继承与发展，进一步被嵌入“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对抗的图景之中。^⑥

2. 科恩二分法的不同维度。科恩指出，民族主义的本质在于“要求每个民族都应该组成一个国家，而国家应该包括整个民族，对民族国家的忠诚应当凌驾于所有其他公共忠诚之上”。^⑦但在他看来，民族主义并不相同，其本质呈现出一种二分结构：西方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国家工程，它在传播一种本质上是政治性的、范围与国家一致的民族感(sense of nationality)；而非西方的民族主义则是一种最初主要表现在文化方面的、对现有国家形式的抗议，是一种“教育和宣传的冒险行动，而非政策形塑与治理”。^⑧通过民族主义在不同地区演化的历史过程，科恩确立了这种二分法的不同维度，其中包括以下维度。

① K. Wolf, "Hans Kohn's Liberal Nationalism: The Historian as Prophet,"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 37, No. 4, 1976; K. Jaskulowski, "Western (civic) 'Versus' Eastern (ethnic) Nationalism, The Origins and Critique of the Dichotomy," *Polish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171, No. 1, 2010.

② H. Kohn, *The Idea of Nationalism: A Study in Its Origins and Background*,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44, 2010.

③ 马戎：《如何理解马克思、恩格斯论著中的“民族”和“民族主义”》，《中国学术》2012年第32辑。

④ John Coakley,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Kohn Dichotomy'," *Nationalities Papers*, Vol. 46, No. 2, 2018.

⑤ John Plamenatz, "Two Types of Nationalism," in Eugene Kamen ed., *Nationalism: The Nature and Evolution of an Ideal*,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3, p. 22.

⑥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Vol. 72, No. 3, 1993.

⑦ H. Kohn, *The Idea of Nationalism: A Study in Its Origins and Background*, p. 16.

⑧ H. Kohn, *The Idea of Nationalism: A Study in Its Origins and Background*, p. 330.

第一,地理空间层面的“西方”与“非西方”。虽然科恩的二分法常被概括为“西方的(公民的)和东方的(族裔的)民族主义”,^①但严格来说,科恩并没有使用“东方”来指代“族裔民族主义”。他一方面使用“西方”和“西方民族主义”重点分析了五个民族国家:荷兰、瑞士、英国、法国和美国;另一方面,他用“西方世界以外”分析了德国、俄罗斯、爱尔兰、意大利、印度等中东欧和亚洲的民族国家。^②

第二,历史源头的“古希腊传统”和“罗马帝国传统”。科恩认为,虽然民族主义是随着法国大革命才广为传播的现代现象,但它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欧洲文明传统,也与犹太文明相连。他表示,是民族和民族主义的观念传播到非西方的地区过程中,其关注的重心变成了文学、民俗、母语和历史,从而变得堕落、暴力、危险,直到影响到了希特勒和纳粹德国。^③科恩认为这种历史分化始于文艺复兴时期,而德国之所以成为有害的民族主义形式的发源地,恰恰是因为此时的德国人文主义者“加工”了罗马帝国的辉煌历史,论证德意志文明比其他文明更古老、更优越,直到转向了民族主义时期对“生存空间”的追求。

第三,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的维度。在科恩的理论中,西方民族主义根植于强大的中产阶级社区,深受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影响;它建立在理性思维方式和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基础之上,是前瞻的、包容的、开放的;其民族开放成员资格、注重社会契约、倾向于民主政治、限制国家权力,是一种现代政治性的民族主义。而与之相对,东方民族主义出现在中产阶级薄弱的地区,由诗人、学者等文化精英传播,深受德国浪漫主义影响;它建立在原始的、感性的、神秘思维方式和部落情感的基础上,是向后溯源的、排他的、封闭的;其民族成员资格基本由出生因素和种族归属决定,强调“鲜血与土地”,注重英雄主义和历史叙事,倾向于美化集体认同和强权专制,是一种文化性的民族主义。^④前者以法国为代表,后者以德国为代表。

第四,社会心理维度。科恩认为,在启蒙主义的影响下,西方的民族主义追求理性和自由,在一种社会进步的乐观、自信氛围中成长,愿意在彼此平等、互相尊重的基础上与外国互动;而非西方的民族国家与西方互动的过程中,在物质和科技的竞争中屡屡受挫,更容易选择通过敌视西方来安抚自己受伤的自尊,并强调自己的民族具有更丰富的情感和更久远的历史,^⑤其民族主义建筑在一种自卑、受挫和敌意的基础上,容易激发好战的冲动。^⑥这种视角在此后的多位学者著作中得到回响,例如,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指出,非西方民族在接受西方民族主义的内容时,也含有一种对西方本身的抗争与排斥,对外来文化在认知和道德上的主导呈现出

① John Hutchinson and Anthony D. Smith Eds. *Nationalism*. Oxford—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162.

② H. Kohn, *The Idea of Nationalism: A Study in Its Origins and Background*, pp. 329—331.

③ H. Kohn, *The Idea of Nationalism: A Study in Its Origins and Background*, p. 9.

④ K. Wolf, “Hans Kohn’s Liberal Nationalism: The Historian as Prophet,”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 37, No. 4, 1976; K. Jaskulowski, “Western (civic) ‘Versus’ Eastern (ethnic) Nationalism, The Origins and Critique of the Dichotomy,” *Polish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171, No. 1, 2010.

⑤ K. Jaskulowski, “Western (civic) ‘Versus’ Eastern (ethnic) Nationalism, The Origins and Critique of the Dichotomy,” *Polish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171, No. 1, 2010.

⑥ H. Kohn, *The Idea of Nationalism: A Study in Its Origins and Background*, pp. 330; H. Kohn, *Nationalism: Its Meaning and History*. Princeton: D. Van Nostrand Company, 1955, pp. 30; Yael (Yuli) Tamir, “Not So Civic: Is There a Difference between Ethnic and Civic Nationalism?”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2, No. 1, 2019.

“既接受又拒绝”的矛盾心态；^①格林菲尔德(Liah Greenfeld)也认为，在德国和俄罗斯，与民族主义伴随出现的怨恨源于它们对更优越的英美等国的嫉妒之情，同时这种怨恨又助长了它们特殊的自豪感和仇外心理。^②

科恩的民族主义二分法大体可用表1予以简单概括。

表1 汉斯·科恩的民族主义二分法主要维度

	西方民族主义	东方民族主义
地域	英国、法国、荷兰、瑞士、美国	俄罗斯等“其他地方”
标签	公民民族主义；国家/政治民族	族裔民族主义；文化民族
历史发源	古希腊文明、犹太文明	罗马帝国
智识传统	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	德国浪漫主义
团结基础	社会契约(选举)	“鲜血与土地”(族裔)
哲学原则	自由主义、个人主义	决定论、整体论
成员资格	公民身份(相对主观)	血缘(相对客观)
阶级基础	中产阶级	精英十大众
发展导向	向未来开放的结构	根植于过去的传统
政治倾向	民主政治；“每日公民投票”	强权政治、专制政体
社会心理	自尊、自信、合作、理性	受挫、自卑、仇外、部落情感
移民政策	出生地主义	血统原则

这种民族主义的二分法为何能够产生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力？在当代民族国家的政治进程中，科恩二分法如何帮助我们理解国族建构中不同的政治实践路径？这种理论框架具有哪些价值，又表现出了何种局限？接下来，本文将哈萨克斯坦为例，分析其作为新民族国家在族裔和公民民族主义两种路径中的探索与权衡。

三、国族建构的双重路径：哈萨克人，还是哈萨克斯坦人？

1. 哈萨克斯坦：国族建构的现实困境。1991年12月，哈萨克斯坦宣布独立，成为民族国家世界格局中的新成员。此时，匆忙成立的哈萨克斯坦面临着国家建设(state-building)和国族建构(nation-building)的双重任务。就前者而言，脱离苏维埃后，想要成为真正独立的民族国家，它必须进行大刀阔斧的国家建设，迅速建立起有效运转的选举体系、官僚机构，以及国防、经济、教育等一系列相关的制度。但另一方面，其国族建构的任务似乎同样迫切，它不得不出巨大努力，利用人们对国家和相应领土的情感依恋来创建一种有效的国族身份。^③

^① Partha Chatterjee, *Nationalist Thought and the Colonial World?: a Derivative Discourse*, London: Zed Books for the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1986, p. 2.

^② Liah Greenfeld, *Nationalism: Five Roads to Modernit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16.

^③ Pål Kolsto, “Anticipating Demographic Superiority: Kazakh Thinking on Integration and Nation Building,” *Europe-Asia Studies*, Vol. 50, No. 1, 1998.

最直接、最根本的任务是,作为以“哈萨克”命名的民族国家,哈萨克斯坦如何应对自身的人口结构带来的挑战。在独立前夕,该国总人口中,哈萨克族与俄罗斯族几乎相当,各占约40%,其他族群(乌孜别克族等)约占20%。但随着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建立,所有此地的居民,无论其族群认同或语言使用情况,均自动获得了该国公民身份。于是,在所有新独立的苏联加盟共和国中,哈萨克斯坦成为唯一的“命名主体人群”不占总人口多数的国家。从20世纪70年代起,作为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哈萨克斯坦中,俄罗斯族的人口比例长期就高于哈萨克族;直到1989年统计时,哈萨克族的人口比例(40.1%)才略微超过俄罗斯族(37.4%),但仍然不足全国人口半数(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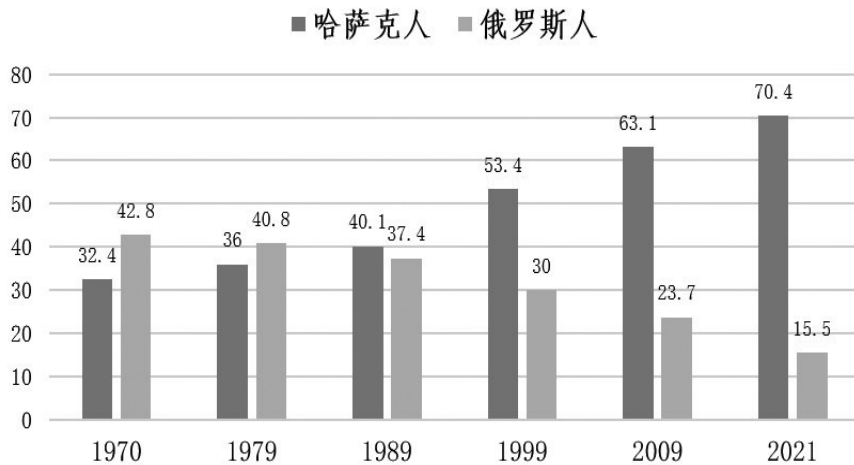


图1 哈萨克斯坦人口结构的变化(1970—2021)^①

更雪上加霜的是,在苏联统治的70年间,尽管大量的俄罗斯人移民到哈萨克斯坦,但他们并未被“哈萨克化”——1989年的人口统计中,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中流利掌握哈萨克语的俄罗斯族不足1%,几乎所有俄罗斯族和其他少数民族都以俄语为母语,^②这一点在哈萨克斯坦独立后也未有明显变化。^③而另一方面,大量的哈萨克族在文化和语言方面却高度“俄罗斯化”——到独立之时,俄语仍是该国官方语言和社会中最流行的语言。1989年,该国64%的哈萨克人自称俄语流利(同期其他中亚国家的命名民族中,俄语流利的比例仅有23%—37%),^④大约25%—40%的哈萨克族几乎不用或完全不懂哈萨克语。^⑤哈萨克斯坦似乎比其他中亚国家都更加贴近俄罗斯,乌孜别克人甚至有笑话称,“想要把一个乌孜别克人变成俄罗

^① Zhe Zhang and Sansar Tsakhirmaa, “Ethnonationalism and The Changing Pattern of Ethnic Kazakhs’ Emigration From China to Kazakhstan,” *China Information*, Vol. 36, No. 3, 2022; 2021年增补数据来自哈萨克斯坦统计局报告, <https://stat.gov.kz/api/getFile/?docId=ESTAT464825>, 浏览时间:2022年12月6日。

^② Davé, Bhavna, *Kazakhstan: Ethnicity, Language and Power*,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③ D. D. Laitin & J. T. Watkins IV, *Identity in Formation: The Russian-speaking Populations in the Near Abroad*,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36.

^④ W. Fierman, “Language and Identity in Kazakhstan: Formulations in Policy Documents 1987—1997,”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Vol. 31, No. 2, 1998.

^⑤ W. Fierman, “Language and the Defining of Identity in Kazakhstan: the Challenges of Sovereignty and Independence,” *Report of the National Council for Soviet and East European Research*, <https://www.ucis.pitt.edu/nceer/1997-810-19-2-Fierman.pdf>, 浏览时间:2022年12月4日。

斯人,你必须先把他变成一个哈萨克人”。^①

此外,俄罗斯族人口在新生的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境内的地理分布,基本聚集在与俄罗斯接壤的北部地区,这也引发了哈萨克社会相当的警惕。从18世纪起,俄罗斯就开始对包括哈萨克汗国在内的中亚地区进行殖民征服,并最终于19世纪下半叶将中亚诸汗国全部纳入自己的领土,随后逐步开展了向草原总督区和突厥斯坦总督区(如今哈萨克斯坦北部地区)的移民过程。1925年,在苏联主导下,以历史上哈萨克汗国的大致疆域成立了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但哈萨克斯坦的北部确实保持了较高的俄罗斯人口比例。^②到哈萨克斯坦独立前夕,该国北部和东部地区的俄罗斯族人口比例仍然相当之高,例如,北哈萨克斯坦州(60%)、东哈萨克斯坦州(63%)等。^③此外,大部分俄罗斯族人口集中于城市地区,工业化程度较高,而哈萨克族多分散居住在广大乡村。

由于其复杂历史和人口分布情况,著名的苏联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曾在其1990年的著作中提出:“(哈萨克斯坦)目前的庞大领土是……以一种完全随意的方式拼凑起来的:每年迁徙的牧群走到哪里,哪里就被叫作哈萨克斯坦……它是由西伯利亚南部和南乌拉尔地区,加上人口稀少的中部地区组装起来的,是被俄罗斯人、劳改营的囚犯和流亡者改造而来的。今天,在整个哈萨克斯坦明显过于膨胀的领土上,哈萨克族不到其人口的一半。他们集中在南部的一大片弧形土地,这里是他们长期的世居领地……这里的人口确实以哈萨克族为主。如果他们愿意沿着这种界限分离,我会说,祝你成功(Godspeed)。”^④

2007年,普京曾拜访索尔仁尼琴并表示,自己为俄罗斯制订的蓝图“在很大程度上符合索尔仁尼琴的写作”。由此,俄罗斯在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之后,有研究者据此推断,哈萨克斯坦很可能面临乌克兰类似的麻烦。^⑤总之,布鲁贝克(Rogers Brubaker)的理论^⑥可以解释20世纪90年代初的哈萨克斯坦,以及当时很多其他从苏联解体中诞生的国家。它们是典型的“民族化的国家”(nationalizing state),一方面,它被政治文化精英理解为“民族国家”,存在相应的“命名民族”,也建立了与之相应的国家(state);但另一方面,它却又还不够“民族化”(not national enough),其在政治、文化等领域的主导权未能充分确立,是一种不完整的、未完成的“民族国家”。于是,此时哈萨克斯坦的国族建构道路,首先很自然地走上了族裔民族主义的、“哈萨克化”的道路。

2. “哈萨克人”认同:族裔民族主义的国族建构。哈萨克斯坦国族建构的族裔民族主义道

^① W. Fierman, “Language and Identity in Kazakhstan: Formulations in Policy Documents 1987–1997,”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Vol. 31, No. 2, 1998.

^② 哈坎·格奥尔吉·瓦西利耶维奇著、中国社科院丝绸之路研究院等译:《哈萨克斯坦简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35页。

^③ *Statistical Committee of the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Results of the All-Union 1989 Census*, Minneapolis: East View Publications, Vol. 7, 1998, p. 376.

^④ A. Solzhenitsyn, *Rebuilding Russia: Reflections and Tentative Proposals*, Translated from Russian by Alexis Klimoff,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Inc., 1990, pp. 7–8.

^⑤ Politico Magazine: Peter Eltsov, *What Putin's Favorite Guru Tells Us About His Next Target*, 2015, <https://www.politico.com/magazine/story/2015/02/vladimir-putin-guru-solzhenitsyn-115088/>, 浏览日期:2023年1月5日。

^⑥ R. Brubaker, “National Minorities, Nationalizing States, and External Homelands in the New Europe,” *Daedalus*, Vol. 124, No. 2, 1995.

路,首先是由一系列法律和行政命令确立并保障的。在独立之前的1989年,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就通过法律,确立了哈萨克语为国语。1993年1月,独立后的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通过其第一部宪法,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被描述为“哈萨克民族的国家形式”,而哈萨克族被赋予“哈萨克斯坦国家的族裔文化核心”(ethnocultural core)和“国家创建民族”(state-forming nation)的地位。可以说,作为国家命名民族的哈萨克族,其族裔民族主义的自我认同被宪法确立为了全体公民政治认同的基础和规范。1995年宪法的序言中,则点明了哈萨克斯坦是在哈萨克原住民的土地(the indigenous Kazak land)上建立的。^① 1996年5月,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发表了《关于形成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国家认同概念》的总统令。该命令称,每个族裔群体都需要自己的国家来满足该群体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它特别指出,哈萨克斯坦社会的多族群格局是非哈萨克族群体向“哈萨克人的领土”移民的结果,而这些群体在其他地方本身拥有家园,可以解决它们的关切。因此,哈萨克族理应在哈萨克斯坦拥有特殊的地位,哈萨克斯坦作为民族国家,应该从这个起点开始发展。^②

整体而言,在20世纪90年代的国族建构中,哈萨克斯坦更倾向于支持建构一个“哈萨克族”的身份认同,而不是试图发展一个更多元的、更具公民民族主义色彩的“哈萨克斯坦人”认同。^③ 究其原因,学者们曾提及独立后哈萨克斯坦的大规模快速城市化导致大量哈萨克族年轻人从农村地区向城市集中,引发激进的哈萨克族民族主义扩张;^④ 随着对苏联时期集体化政策导致哈萨克斯坦饥荒等敏感历史问题的解禁,公众对于苏联的“殖民”历史产生了激烈的反弹情绪,同时知识分子也在通过官方批准的学校历史叙事大力支持哈萨克族民族主义。^⑤

在国族建构的过程中,哈萨克斯坦实施的最有效的政策为“回归者”(oralman)计划。^⑥ 在哈萨克语中,oralman意为“回归者”,在1997年12月13日的《移民法》中,“回归者”被定义为“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获得主权时长期居住在境外、来到哈萨克斯坦长期居住的哈萨克裔外国人或无国籍人士”。^⑦ 这是一项非常“民族化”的移民政策,充满了“鲜血与土地”的色彩。也就是说,有资格“回归”的是哈萨克人,“族裔回归移民”方案是要鼓励流散在外的哈萨克人“回归”到一个新成立的国家,这个新生的国家则被想象成了所有哈萨克人的“历史家园”。

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族裔移民行动被称作“纠正哈萨克民族历史积怨”。散居在其他国家

① O. Kesici, “The Dilemma in The Nation-building Process: The Kazakh or Kazakhstani nation?,” *Journal on Ethnopolitics and Minority Issues in Europe*, Vol. 10, No. 1, 2011.

② J. Lillis, *Astana Follows Thorny Path toward National Unity*, <http://www.eurasianet.org/node/60952>, 2010, 浏览日期:2023年1月5日。

③ I. Svanberg, “In Search of a Kazakhstani identity,” *Journal of Area Studies*, Vol. 2, No. 4, 1994.

④ William Fierman, “Changing Urban Demography and the Prospects of Nationalism in Kazakhstan,” *Canadian Review of Studies in Nationalism*, No. 1, 2000.

⑤ Pål Kolsto, “Anticipating Demographic Superiority: Kazakh Thinking on Integration and Nation Building,” *Europe-Asia Studies*, Vol. 50, No. 1, 1998; A. Diener, “National Territory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History in Kazakhstan,”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Vol. 43, No. 8, 2000.

⑥ 应当指出,“oralman”的提法在近年来的哈萨克斯坦官方叙述中逐渐被“Kandas”取代,后者意为“共享血缘的人”,或“同胞亲人”。但现实社会中,“oralman”的叫法并未停止。参见 Nurtai Lahanuly, *The Term “oralman” Has been Replaced by “kandas”, What Do Repatriates and Experts Think of This?* <https://rus.azattyq.org/a/kazakhstan-oralman-kandas/30323211.html>, 2019, 浏览日期:2023年1月7日。

⑦ Takeyuki Tsuda, “Why Does the Diaspora Return Home? The Causes of Ethnic Return Migration,” Takeyuki Tsuda ed., *Diasporic Homecomings: Ethnic Return Migra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21.

的哈萨克人被描绘成由于苏联“大规模政治镇压、非法征用、强迫集体化和其他人类行为”而被迫离开家园的哈萨克难民的后代。^①，他们是“由于历史的意外而彼此分离了几十年的亲兄弟”。^② 在20世纪20—30年代，在苏联的统治下，估计有多达250万哈萨克人从苏联移居至中国新疆和蒙古等地，以逃避集体化、饥荒和镇压。^③ 1992年9月，哈萨克斯坦举行第一届世界哈萨克人大会时，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就发表讲话强调，“对于那些曾经不得不离开祖国现在又希望回来的人，独立的哈萨克斯坦向你们敞开怀抱”。^④

但毫无疑问，oralman计划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功用，即改变哈萨克斯坦的人口结构，使哈萨克族迅速成为统计意义上的主体人群。该方案对邻国的许多哈萨克人都有相当的吸引力：因为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支付搬迁和重新安置的津贴，还提供相当可观的社会福利，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配额内的移民有资格获得包括住房、牲畜、职业培训和免费医疗、语言培训补贴等可观的福利；^⑤同时，这种移民完全基于族裔身份，而并不涉及很多其他国家移民政策中对教育水准、专业技能等条件的限制。^⑥

从1991年起，该方案使超过109.5万哈萨克人从邻国移民到哈萨克斯坦。^⑦ 同时期，大量的俄罗斯族移民离开哈萨克斯坦。该国的人口结构迅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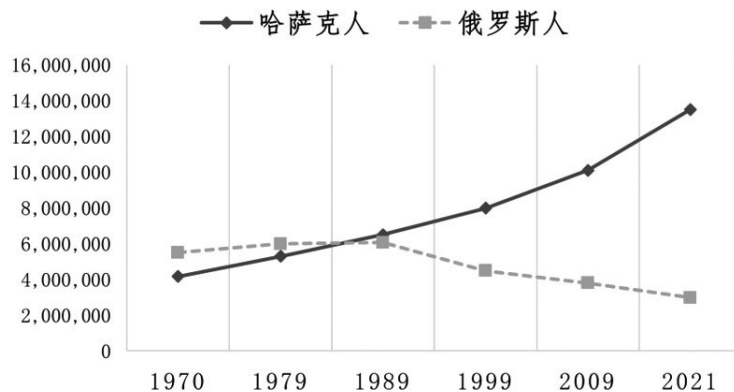


图2 哈萨克斯坦人口结构变化(1970—2021)^⑧

① Alexander C. Diener, *One Homeland or Two? The Nationalization and Transnationalization of Mongolia's Kazakh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264.

② Isik Kuscu, Bonnenfant, "Constructing the Homeland: Kazakhstan's Discourse and Policies Surrounding Its Ethnic Return—migration Policy," *Central Asian Survey*, Vol. 31, No. 1, 2012.

③ Edward A. D. Schatz, "Framing Strategies and Non—Conflict in Multi—ethnic Kazakhstan," *Nationalism and Ethnic Politics*, Vol. 6, No. 2, 2000.

④ Isik Kuscu, Bonnenfant, "Constructing the Homeland: Kazakhstan's Discourse and Policies Surrounding its Ethnic Return—Migration Policy," *Central Asian Survey*, Vol. 31, No. 1, 2012.

⑤ Holly Barcus & Cynthia Werner, "The Kazakhs of Western Mongolia: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from 1990—2008," *Asian Ethnicity*, Vol. 11, No. 2, 2010.

⑥ Takeyuki Tsuda, "Why Does the Diaspora Return Home? The Causes of Ethnic Return Migration," in Takeyuki Tsuda, ed., *Diasporic Homecomings: Ethnic Return Migra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2009, p. 21.

⑦ 据哈萨克斯坦劳动和人口社会保障部新闻处2022年7月4日公告，自1991年以来，已有109.5万名哈萨克族人“返回”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其中，在2022年前6个月中，有7415名哈萨克族人“返回”。https://el.kz/en/7500_ethnic_kazakhs_have_returned_to_their_historical_homeland_43645/，浏览日期：2022年12月1日。

⑧ Zhe Zhang and Sansar Tsakhirmaa, "Ethnonationalism and The Changing Pattern of Ethnic Kazakhs' Emigration From China to Kazakhstan," *China Information*, Vol. 36, No. 3, 2022; 2021年增补数据来自哈萨克斯坦统计局报告。

从 1989 年到 2021 年,哈萨克斯坦的哈萨克族人口翻番,从 650 万增加到 1350 万,而同期俄罗斯族人口减半,从 606 万降低到 298 万;两个族群在 1989 年时人口相差无多,但到了 2021 年,哈萨克族已占全国人口 70.4%,俄罗斯族仅占 15.5%(见表 2)。

表 2 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族群人口结构(1970—2021)

	1970		1979		1989		1999		2009		2021	
	人口	比例 (%)	人口	比例 (%)	人口	比例 (%)	人口	比例 (%)	人口	比例 (%)	人口	比例 (%)
哈萨克人	7,161,164	32.4	5,293,377	36.0	6,496,858	40.1	7,985,039	53.4	10,096,763	63.1	13,497,891	70.4
俄罗斯人	5,499,826	42.8	5,991,205	40.8	6,062,019	37.4	4,479,620	30.0	3,793,764	23.7	2,981,946	15.5
乌克兰人	207,514	1.6	897,964	6.1	875,691	5.4	547,054	3.7	333,031	2.1	387,327	2.0
日耳曼人 (Ethnic German)	930,158	7.2	900,207	6.1	946,855	5.8	353,441	2.4	178,409	1.1	226,092	1.2
乌孜别克人	839,649	6.5	263,295	1.8	331,042	2.0	370,663	2.5	456,997	2.9	614,047	3.2
其他	1,210,262	9.5	1,338,235	9.2	1,751,999	9.3	1,237,309	8	1,150,633	7.1	1,478,712	7.7
总计	12,848,573	100.0	14,684,238	100.0	16,464,464	100.0	14,973,126	100.0	16,009,597	100.0	19,186,015	100.0

数据来源:部分源自 Zhe Zhang and Sansar Tsakhirmaa, “Ethnonationalism and The Changing Pattern of Ethnic Kazakhs’ Emigration From China to Kazakhstan,” *China Information*, Vol. 36, No. 3, 2022; 2021 年增补数据来自哈萨克斯坦统计局报告, <https://stat.gov.kz/api/getFile/? docId=ESTAT464825>。

除了直接增加哈萨克族的人口、改变全国人口的族群结构之外,oralman 方案还间接复兴和加强了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哈萨克语言和文化。来自蒙古和中国的哈萨克族移民此前居住在哈萨克族相对集中、哈萨克语言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地区,相比“俄罗斯化”的哈萨克斯坦公民,这些移民往往比此苏联境内的哈萨克族更好地保留了流利的哈萨克语言和更多的传统文化习俗。

此外,哈萨克斯坦还引入了大量哈萨克文化符号。阿拉木图中心的列宁雕像被替换成了黄金战士的雕像,这个神话人物早在公元前三世纪就扎根于哈萨克人的身份之中。^① 大量苏联的街道和城镇名称被哈萨克人的名字所取代。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国旗并没有星月等伊斯兰宗教符号(这些符号在乌孜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国旗中都有体现),而是加入了哈萨克族的传统饰品符号,例如,用太阳下的老鹰象征哈萨克在草原的生活;其国徽也体现了哈萨克族传统毡房圆顶(shanyraq)。^②

总之,20 世纪 90 年代的哈萨克斯坦国族建构带有清晰的族裔民族主义印记,其官方赋予哈萨克文化“无可争议的优先地位”,强调哈萨克人的历史、语言、风俗、传统、文化是哈萨克斯坦的社会基石,通过教育、民族节庆、历史英雄和民族诗人的颂扬等方式,在新国家中,“哈萨克民族”身份认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特权地位。国家将哈萨克语确定为“官方语言”,并将俄语降级为“族群间交流的语言”;哈萨克语学校的数量一直在增加,政府部门、工作场所和媒体都在大力推广使用哈萨克语。^③ 在最重要的族裔民族主义行动中,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通过提供社会福利和情感动员吸引哈萨克族移民“回归”,仅用了不到 10 年时间就确立了哈萨克族在人口

① A. Aydingün, “State Symbols and National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Kazakhstan,” in I. Bellér-Hann, ed., *The Past as a Resource in the Turkic Speaking World*. Würzburg: Ergon-Verl, 2008, p. 139.

② O. Kesici, “The Dilemma in the Nation-building Process: The Kazakh or Kazakhstani Nation,” *Journal on Ethnopolitics and Minority Issues in Europe*, Vol. 10, No. 1, 2000.

③ A. Aksholokova & N. Ismailova, “The Language Policy of Kazakhstan and the State Language in Government Service,” *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Vol. 93, No. 1, 2013.

中的多数地位,并不断提高其比例。进入2000年以后,人们逐渐感觉到国族建构的危机似乎逐渐退散,越来越多的呼声开始提倡哈萨克斯坦去建立一种更加公民民族主义的认同。

3. “哈萨克斯坦人”认同:公民民族主义的兴起。进入21世纪后,随着哈萨克族的人口比例逐渐超过了全国人口的60%，“主体民族”的危机淡去,此前取得巨大成功的oralman移民工程逐渐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声。向回归者提供的福利对哈萨克斯坦政府来说是越来越大的财政负担,也引发了一些本国原有公民的不满。不少人认为,当哈萨克斯坦面临结构改革而来的高通膨和失业问题时,回归者的福利高于现有公民极其不合理。批评者抱怨oralman计划的成本太高,且回归者也未能如预期的那样对哈萨克斯坦的国民经济做出实质性贡献。^①

回归者也在面临越来越多的难题。他们被承诺在“返回”新生国家后有一个光明的未来,但现实中,族裔民族主义承诺的“哈萨克人的国家”并未弥合回归者与其他本土哈萨克人之间的鸿沟:高失业率、儿童入学困难、缺乏融合机制、对日常生活中的苏联文化不熟悉,对俄语的了解不足,都给回归者造成了巨大的困难。^② 根据移民委员会的数据,2006年,工作年龄阶段的回归者就业率只有61.5%,而同期哈萨克斯坦本地人口的平均就业率为91.6%。并且,由于偏见和刻板印象,哈萨克斯坦本土的雇主往往不愿意雇用回归者,称他们“落后、鲁莽”。^③

哈萨克斯坦政府也做出了相应的调整。2005年,纳扎尔巴耶夫在世界哈萨克人大会发表讲话时借用了约翰·肯尼迪的名言,称一个回归者“不应该考虑哈萨克斯坦会给他什么,而应该考虑他能给哈萨克斯坦带来什么”。^④ 2008年,哈萨克斯坦推出了Nurly Kosh移民项目,第一次正式表示该国将优先考虑受过高等教育和有技能的回归者移民,尤其鼓励此前离开哈萨克斯坦的高技术工人回归;事实上,自2000年中期以来,oralman政策就已经悄然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行政人员、“资本承载”人员、高技能工人和不考虑族裔身份的高级专家的移民机会显著增加,而不持有资产的、技能非常有限的哈萨克人移民则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⑤ 同时,回归者的福利已经逐渐减少——他们能收到一次性的安置津贴(每人大约能收到850美元,户主翻倍),^⑥但很难再拿到单独支付的交通、住房和牲畜费用。

但此时没有人想到,oralman计划会突然中止。2011年5月起,哈萨克斯坦西部的石油工业区曼吉斯托(Mangistau)地区爆发了石油工人的大规模罢工,要求增加福利津贴、改善工作环境等;罢工一直持续到了年底,12月16日,在当地的扎瑙津镇(Zhanaozen)爆发了致命冲突,造成至少14名平民死亡,近百人受伤。^⑦ 事后的舆论中,很快有哈萨克族的网络博主将扎

^① Isik Kuscu, “Ethnic Return Migration and Public Debate: The Case of Kazakhsta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Vol. 52, No. 2, 2014.

^② M. Laruelle, “The Three Discursive Paradigms of State Identity in Kazakhstan,” in M. Omelicheva, ed., *Nationalism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Central Asia: Dimensions, Dynamics, and Directions*, New York: Lexington Books, 2014, p. 1.

^③ A. C. Diener, “Kazakhstan’s Kin State Diaspora: Settlement Planning and the Oralman Dilemma,” *Europe – Asia Studies*, 2005, 57(2), pp. 338.

^④ Isik Kuscu, Bonnenfant, “Constructing the Homeland: Kazakhstan’s Discourse and Policies Surrounding its Ethnic Return—Migration policy,” *Central Asian Survey*, Vol. 31, No. 1, 2012.

^⑤ Cynthia Ann Werner, Celia Emmelhainz, & Holly Barcus, “Privileged exclusion in post-Soviet Kazakhstan: Ethnic Return Migration, Citizenship, and the Politics of (not) Belonging,” *Europe—Asia Studies*, Vol. 69, No. 10, 2017.

^⑥ L. Tusupbekova, “Migratsiya i Ratsionalizatsiya,” *Kazakhstanskaya Pravda*, Vol. 11, No. 4, 2008.

^⑦ Aljazeera, *Deadly Riots Spread in Kazakhstan Oil Region*,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11/12/18/deadly-riots-spread-in-kazakhstan-oil-region>, 浏览时间:2023年1月13日。

璁津事件反映出的社会经济困难与接受大量回归者移民联系起来。一位博主写道：“肯定有一个大约 15—20 人的骨干领导整个人群。回归者？这是可能的。大多数抗议者都不是本地人……他们很可能扮演了某种角色。”^①一些政府成员也立即跟进指出“新哈萨克人”或“回归者”的问题，他们认为 oralman 计划导致大量回归者涌入一个缺乏基础设施的地区，从而间接引发了罢工。^②总之，主流媒体与博主们纷纷谈论大量回归者对哈萨克斯坦政治稳定构成的威胁，尤其是他们缺乏工作和语言技能等问题；有媒体言之凿凿，称引发冲突的人当中有 25% 是回归者。^③

实际上，在 2000 年以后，公民民族主义的呼声就已经日益高涨。在 2004 年的哈萨克斯坦人民大会(Assembly of people of Kazakhstan)上，纳扎尔巴耶夫发表讲话，在指出本国族群多样性的同时，宣称一个超族群共同体——“哈萨克斯坦民族”(kazakhstanskaia natsiia, 即 Kazakhstani nation)——正在形成；他将其描述为一种“族群(etnosy)的自由联合”及其“文化—政治和社会—经济的统一”。^④这是第一次由哈萨克斯坦官方提出具有超族裔的、公民民族主义理念的认同——“哈萨克斯坦民族”，并迅速在知识界和公共媒体讨论中引发了巨大的声浪。

对于哈萨克(族裔)民族主义者而言，“哈萨克斯坦民族”的提法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哈萨克族作为国家命名民族和原住民的地位——哈萨克斯坦成了包括 120 多个族群在内的全体公民的“共有家园”，而不再是此前唯一的原住民哈萨克族的“历史家园”。^⑤要知道，族裔民族主义者一直强调的是，哈萨克斯坦是哈萨克人的家园，即便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族群“平等”，国家也必须保证哈萨克文化成为“平等者中的第一位”，至于包括俄罗斯族在内的少数民族，他们是作为“客人”居住在这个国家，应当按照主人(哈萨克族)的规则来生活。^⑥

但此时，随着这个新生民族国家“哈萨克化”的确立，人们开始更多讨论族裔民族主义道路的负面效应：从国内的俄罗斯族，到俄罗斯联邦的媒体中，不时有对哈萨克斯坦“语言歧视”等政策的批评；大量的俄罗斯族选择移民外流，其中多为北部工业区的技术工人或职业人士，也造成了人力资本的严重流失。

于是，哈萨克斯坦此时越来越强调国境之内哈萨克人和非哈萨克人的联结，对“哈萨克斯坦民族”的建构过程，往往要诉诸此前在苏联时期，这块土地上人们共同的悲惨命运。例如，纳扎尔巴耶夫曾谈论，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饥荒和大清洗运动中，这片土地上的俄罗斯族、哈萨克族和其他族群共同遭遇了迫害和厄运。^⑦2010 年 5 月，纳扎尔巴耶夫公布的“民族团结理论”，强调“同一片土地，同一种命运”，将哈萨克斯坦人作为一个整体，与哈萨克斯坦这块土地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哈萨克斯坦民族”的边界向外扩展，将哈萨克族之外的所有族群都包

① D. Beisembayeva, E. Kolesova, and E. Papoutsaki, “The Zhanaozen Crisis and Oralman’s Place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Kazakh National Identity,” *New Zealand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19, No. 2, 2017.

② Eurasianet: Nate Schenkkan, “Kazakhstan: In Restive Oil Town, Astana’s Outreach Meets Anger,” <https://eurasianet.org/kazakhstan-in-restive-oil-town-astanas-outreach-meets-anger>, 2012, 浏览时间:2023 年 1 月 13 日。

③ D. A. Zhampeissof, “Legal Aspects of Ethnic Repatriation: Comparative and Juridical Analysis,” *Middle-East Journal of Scientific Research*, Vol. 15, No. 6, 2013.

④⑥ W. Fierman, “Kazakh Language and Prospects for its Role in Kazakh “Groupness”,” *Ab Imperio*, No. 2, 2005.

⑤ N. Aitymbetov, E. Toktarov, & Y. Ormakhanova, “Nation—building in Kazakhstan: Kazakh and Kazakhstani Identities Controversy,” *Bilig*, Vol. 74, No. 1, 2015.

⑦ O. Kesici, “The Dilemma in the Nation—building Process: The Kazakh or Kazakhstani Nation?” *Journal on Ethnopolitics and Minority Issues in Europe*, Vol. 10, No. 1, 2011.

含在内。不过,“哈萨克斯坦民族”共同体的提出也让俄罗斯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担忧,他们担心“哈萨克斯坦性”(Kazakhstani-ness)的强调会发展成一个由哈萨克人主导的“少数民族同化”工程。^① 作为回应,纳扎尔巴耶夫宣布2004年为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俄罗斯年”,甚至在一次讲话中公开批评了本国“过快地用哈萨克语取代俄语的企图”,称“是俄语团结了我们的民族(natsiia),我们国家的所有公民。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这不是谁的错。我们需要时间让哈萨克语开始发挥统一的作用,不应该操之过急”。^② 总体而言,哈萨克斯坦境内的俄罗斯族和哈萨克族之间维持了相对和平稳定的关系,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暴力冲突或歧视事件。尽管面临政治和社会地位的相对边缘化,很多俄罗斯族选择移民到俄罗斯,但留在哈萨克斯坦的俄罗斯族仍然在相当程度上保留了自己的语言、文化和宗教,并享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

4. 将“族裔”带回国族建构中。如果到此为止,哈萨克斯坦的故事似乎在印证科恩二分法,即“西方以外”的民族国家从族裔民族主义走向公民民族主义。一种超越族裔、语言、出生地的“哈萨克斯坦人”身份、一条公民民族主义的国族建构道路似乎成了政治团结、国家前进的不二选择。然而,如同很多国家发生过的情况一样,哈萨克斯坦的国族建构并未按照这样的进步主义蓝图行进。一次意想不到的事件再次扭转了哈萨克斯坦的国族建构方向。

2014年2月,克里米亚危机爆发。原属乌克兰境内的克里米亚半岛,长期以来俄罗斯族人口占据多数;截止危机前,当地人口中俄罗斯族占67.9%,乌克兰族占15.7%。危机中,亲俄武装接管政权,并寻求俄罗斯军事援助,随后俄军进占,克里米亚公投并宣布脱离乌克兰、加入俄罗斯联邦。^③ 这场危机似乎立即为哈萨克斯坦拉响了警铃。哈萨克北部和东部地区一些俄罗斯民族主义者曾对哈萨克斯坦北部领土提出过主张,在俄罗斯社交网络VKontakte上,分离主义言论也不时出现。^④ 此前该地区的俄罗斯族分离主义者卡兹米尔丘克(Viktor Kazimirchuk)的言论再次被人翻出——他曾经领导分离主义组织“罗斯”,谋求接管哈萨克斯坦东北部靠近俄罗斯边境的奥斯克曼(Oskeman)地区并加入俄罗斯;他被判刑18年,但提前获释回到了俄罗斯。在俄罗斯他接受媒体采访时不但抨击哈萨克斯坦对于俄罗斯族的歧视,还说,“我们与哈萨克斯坦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这里是俄罗斯的领土……比如说,在Pridnestr,^⑤ 或者在克里米亚”。^⑥

哈萨克斯坦迅速作出回应。2014年3月20日,在克里米亚被吞并后不久,当局就通过新法令,大规模重启此前中断的oralman计划,尤其吸引回归者前往特定的7个州安置,以改变

① W. Fierman, "Kazakh Language and Prospects for its Role in Kazakh "Groupness", *Ab Imperio*, No. 2, 2005.

② Vystuplenie N. Nazarbayeva, "Sezde Rabotnikov Obrazovaniia I Nauki," *Kazakhstanskaia Pravda*, Vol. 10, No. 1, 2004.

③ 《乌克兰危机冲击西俄关系》,新华网, http://my.xinhuanet.com/2014-12/31/c_127348701_4.htm, 浏览时间:2023年2月9日。

④ *Sputniknews. Kazakhstan: Piat' let tiur'my za Separatistskii Opros "VKontakte"*, <http://sputnikpogrom.com/news/47006/19-november-2015-1/#.V-6hyvDhDFg>, 浏览时间:2023年2月9日。

⑤ 即 Transnistria, 绝大多数国家认为是摩尔多瓦共和国的一部分,但也有大量俄罗斯族人口,并曾发生公投要求加入俄罗斯联邦。

⑥ Radio Free Europe, *Bruce Pannier, A Tale of Russian Separatism in Kazakhstan*, <https://www.rferl.org/a/qishloq-ovozi-kazakhstan-russian-separatism/25479571.html>, 浏览时间:2023年2月9日。

该国北部地区的人口结构。^① 虽然此后可以安置回归者的地区有所扩大,^②但如果想得到住房补贴、搬迁费用、银行信贷等社会福利,则只能选择与俄罗斯接壤的北部和东部地区。^③

实际上,早在1994年,哈萨克斯坦就把首都从阿拉木图迁往北部俄罗斯人相对聚居的阿克莫拉市(1995年更名为“阿斯塔纳”),此举也被广泛理解为调整国家政治中心、加强对北部地区控制的考量。迁都后,大批哈萨克政府机构、企业总部和服务业随之落户北部,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北部的族群人口结构,加强了对北部的政治控制。2014年之后,随着族裔民族主义情绪迅速全面升温,国有媒体上迅速发表了“哈萨克人,搬到北方去!”等评论;《哈萨克斯坦真理报》又开始热情洋溢地赞颂回归者为“我们国家的骄傲”,称“他们成功地发展了经济和文化,提高了哈萨克语言的地位,丰富了我们的传统,加强了我们的独立性”。^④ 哈萨克的族裔性似乎又重新被带回了该国国族建构的核心地位。

三、批评与讨论:超越科恩二分法

公民民族主义的国族建构道路迅速让位于在再次勃发的族裔民族主义,像是经历了一次轮回。由此可见,哈萨克斯坦的政治实践,也再次说明了汉斯·科恩的二分法只应作为理想型在规范研究中帮助我们理解国族建构机制,但不应作为实证研究的描述来使用。作为“非西方国家”,哈萨克斯坦从民族国家建立初始就允许,甚至鼓励各族群保留自身的文化身份,官方与不同族群的文化中心开展合作,也希望通过将非哈萨克族群体的族裔文化制度化将其纳入哈萨克斯坦的公民框架。尽管哈萨克斯坦的民族化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色彩,注重血缘与土地的联结,强化历史叙事和英雄主义,但大体而言,这种民族化仍然是在民主政治的框架之内进行的,没有放弃社会契约以及对其成员资格的开放性(尽管对不同成员的地位有所争议)。

笔者认为,在当代世界,族裔和公民两种民族主义道路并不存在一种清晰的历史发展的线性方向,也并非绝对互斥,国族建构和政治发展从来都不是单向度的。哈萨克斯坦的国族建构既不是“先公民、后族裔”的“堕落式”民族化,也不是“先族裔、后公民”的进化史观所能解释。恰恰相反,在某种程度上,哈萨克斯坦既想哈萨克化,将国家建成同质化的民族国家和哈萨克族的历史家园,同时也想扩大其民族边界,将所有其他族裔群体纳入一个公民性的“哈萨克斯坦民族”之中。实际上,科恩二分法在二战以后得到了不同学者的认同和发展,例如,盖尔纳(Ernest Gellner)结合自己的民族和民族主义起源的理论,认为西方的公民民族是在高级文化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的,而东方民族则是在地方、大众和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的。^⑤ 叶礼庭(Michael Ignatieff)称公民民族主义是由“一个由平等的、拥有权利的个体组成的社区……团结在一套共同的政治实践和价值观上”,而族裔民族主义的动机是“继承而非选择的深层依

^① Eurasianet: Joanna Lillis, *Kazakhstan: Astana Entices Kazakhs from Abroad Amid Ukraine Crisis*, <https://eurasianet.org/kazakhstan-astana-entices-kazakhs-from-abroadamid-ukraine-crisis>, 2014, 浏览时间:2023年2月9日。

^② 2014年6月8日,哈萨克斯坦政府将安置回归者可接受的地区扩大,基本上在全国只是排除了阿拉木图和阿斯塔纳这两个最主要的都市区。

^{③④} B. Dukeyev, “Ethnic Return Migration in Kazakhstan: Shifting State Dynamics, Changing Media Discourses,” *Migration*, Vol. 52, No. 1, 2014.

^⑤ E.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Oxford, UK: Blackwell, 1983, p. 99.

恋”，个人是由民族共同体定义的，所以是被奴役的、未受教育的大众的民族主义。^① 尽管从安东尼·史密斯、霍布斯鲍姆到格林菲尔德，几乎所有的最有影响力的民族主义理论家都曾经或多或少地对民族主义进行了类似的类型学分析，在冷战后，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对这种理论框架进行了批评。

首先，这种二分法在类型学上并不准确。德国完全可以放在东方和西方两种类别之中；美国虽然被科恩放在西方一侧，但其利用共同的象征和仪式的元素却非常明显；^②波兰在科恩二分法中明确地属于非西方世界，但最新的波兰民族主义却是作为西方式的政治民族主义出现的，等等。并且很多学者都指出，东方民族主义并非由血缘和归属感的非理性吸引力所驱动，而是由模仿西方心态的愿望所驱动：东方的民族想要摆脱帝国的阴影，使自己的政治独立的愿望合法化，不得不使用文化同质性作为一种确保自我统治的方式，但这也说明，民族主义中“族裔”的一面常常也来自西方，而东方只是效仿了它。^③ 实际上，西方民族主义之中也曾存在积极同化主义的雅各宾模式，例如，英法两国都曾发生族群、宗教或文化清洗，^④美国存在大量的族裔民族主义问题（如二战期间的移民法、少数族裔的身份认同等），^⑤但这些却都在很大程度上被科恩刻意忽略了。

其次，从道德层面，后来的学者们也批评了科恩二分法的西方中心主义，甚至种族中心主义——西方的是理性的、自愿的、“好的”，东方是情绪化的、继承的、“坏的”。根据萨义德“东方主义”理论，这种区分方式无疑反映的是一种普遍且根深蒂固的倾向，即利用不同的其他者来定义西方。但很多学者都已经指出这种道德批评的无效。以法国为例，公民的民族主义可能并不保证少数族群的文化权利，这一点与国家保障公民个人人权和个人自由主义可以并行不悖；也就是说，除非是美国这样的“多族群的复合的民族”，公民民族主义并不自然地容纳不同文化群体诉求，实际上，它常常只是保障主导族群的群体权利，也就是占据统治地位的语言、习俗、文化象征和制度，这些制度和政策在“公民的”和“族裔的”民族观念之间并无显著差异。^⑥从这个角度而言，哈萨克斯坦在国族建构中的两重道路固然是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应对不同政治议题和环境的调整，却也包含相当程度的跨地区、跨文化的普遍性和世界各地民族国家国族建构的内在逻辑一致性。

此外，道德二分法的刻板印象使得人们无意中形成了一种对民族和民族主义的单向度的理解，甚至是危险的政治幻觉：正如西方率先孕育和传播了民族主义，现在它将率先超越它们（欧盟被寄望于成为这样一种尝试），东方被认为最终走向成熟，通过将公民/民主价值置于民族价值之上而追赶上西方的脚步，历史也终将超越民族，进入公民时代。然而，哈萨克斯坦不同时期国族建构道路的摇摆和变化也显示出，无论西方还是东方，至少在当下的时代，人类还无法轻易超越族裔因素进入“后民族时代”，自由选择和理性契约也还无法替代族裔文化成为

① M. Ignatieff, *Blood and Belonging: Journeys into the New Nationalism*, London: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93, p. 7.

② ⑤ K. Jaskulowski, "Western (civic) 'Versus' Eastern (ethnic) Nationalism. The Origins and Critique of the Dichotomy," *Polish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171, No. 1, 2010.

③ I. Krastev, *After Europe*.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hiladelphia Press, 2017; Globalinequality Blog; B. Milanovic, *Democracy of Convenience, Not of Choice: Why is Eastern Europe Different?* <http://glineq.blogspot.com/2017/12/democracy-of-convenience-not-of-choice.html>, 浏览时间:2022年12月13日。

④ 赵鼎新:《帝国政治和主导性意识形态——民族运动的起源、发展和未来》,《二十一世纪》2021年12月号,第188期。

⑥ [英]安东尼·史密斯著、叶江译:《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45页。

政治团结的基础。

对于如何破除这种单向度的、从族裔到公民的国族建构迷思,政治学家塔米尔(Yael Tamir)创立了一种循环式的模型分析族裔和公民民族主义在现实发展中的五个阶段。^① 第一,在民族国家的形成期,国家会积极促进以历史叙事、共同语言、规范、文化和符号为基础的统一意识的形成,同质化的力量将主导公共领域。第二,民族认同得到巩固、政权稳定后,国家很快就进入到“平庸的民族主义”阶段,^②国族建构的努力会放松,民族文化的背景变得透明,人们的注意力会转移到阶级等领域。第三,国家进入多元文化主义阶段,少数群体日益活跃,主体人群同意改造现有的社会结构,使其更加开放和包容。第四,国家进入“多样性”阶段,同质性被侵蚀,人们开始对民族国家容纳多样性和内部差异的能力感到自豪,并认为国家将超越民族、进入公民阶段。第五,“后多样性”阶段,意识形态的风向开始发生变化,主体人群中的弱势成员最先对日益增长的多样性表达不满并感到威胁来临;在内外的不同因素作用下,更多的民族主义的声音开始出现,反移民、反多样性的情绪爆发,国族建构可能被迫重回第一阶段。

哈萨克斯坦短暂的三十余年建国历程中,其国族建构却也并未清晰地呈现出塔米尔模型的五个阶段,尤其是并未展现出欧美社会的文化多元主义阶段(塔米尔模型的阶段三)。在内政和外交事件的冲击下,哈萨克斯坦被迫在两条道路中反复摇摆,并试图维系一种谨慎的平衡策略。在其国族建构过程中,其中的族裔性和公民性的特质常常呈现出一种模糊的、流动的状态,而这种状态在不同的国家中都有所呈现。除了普遍性的国族建构认同挑战,每个民族国家都不可避免地还需要应对本土的特殊政治条件和社会环境。哈萨克斯坦主要应对的挑战,并非塔米尔等学者强调的西方世界的文化多元主义和身份政治。该国内部的族群政治一直是在一种相对清晰的二元权力结构之下的博弈,即两种主要族裔群体之间对国家权力和社会规范进行相当直白的争夺,这与欧美持续的移民浪潮带来的多元文化主义的情形大相径庭。哈萨克斯坦的国族建构过程伴随的是旧有族群政治规范的颠覆——此前在族群政治中处于弱势地位、被形容为“落后”的哈萨克族要占据主导、代表国家,而此前居于高位的、占据政治主导的俄罗斯族则必须丧失语言文化的特权,在新的民族国家中进行“自我再定位”。^③ 在这样的博弈中,除了民族国家内部的族群政治,还要考虑国际社会和地缘政治给国族建构带来的巨大影响,尤其是在跨境族群成为民族国家内部的族群政治主角的时候。

此外,哈萨克斯坦在进行国族建构时还面临历史上形成的以部族归属为内核、以玉兹(zhuz,哈萨克汗国时期形成的部落联盟)划分为外壳的地缘民族认同。^④ 在族裔化的国族建构过程中,哈萨克斯坦政府大力宣扬哈萨克族传统文化,也带动了玉兹、家乡(Yurt)等传统身份符号进入社会公共话语中。有学者认为,在1991年以后,玉兹意识和传统部落认同的复兴有利于弥合哈萨克斯坦城市和乡村之间长期以来的认同隔阂(此前城市居民相对更加俄罗斯

① Yael (Yuli) Tamir, "Not So Civic: Is There a Difference between Ethnic and Civic Nationalism?"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2, No. 1, 2019.

② Michael Billig, *Banal Nationalis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1995, p. 3.

③ 学者们指出,在苏维埃政权下,苏联各个共和国的俄罗斯人均享有较高的公共地位和语言文化特权,他们倾向于把整个苏联而不仅仅是俄罗斯共和国视为自己的国家领土。参见 R. Brubaker, "Nationhood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Post-Soviet Eurasia: An Institutional Account," *Theory and Society*, Vol. 23 No. 1, 1994.

④ 艾山江·阿不力孜:《哈萨克斯坦独立后民族认同的架构历程探析》,《西北民族研究》2016年第3期。

化,伊斯兰教色彩也较弱),为促进统一的民族国家认同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①但也有学者认为,这种部落主义强化了任人唯亲的部落忠诚,造成了玉兹之间的隔阂加深,并不利于建立统一的哈萨克人或哈萨克斯坦人认同,^②玉兹意识和部落文化在多大程度上成为核心的身份和忠诚度来源,它与教育程度、地区、职业、宗教等因素如何互动并进一步影响哈萨克斯坦的国族建构,还有待此后进一步研究。

总体而言,作为一个“民族化国家”(nationalizing state),^③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需要建立主体民族的代表性和主导权,使其政治精英的统治合法化,这符合独立民族国家的惯例。看起来哈萨克斯坦似乎有双重国族建构,即“民族化”的道路:一是族裔民族主义的“哈萨克化”道路,即尽量使人口同质化,明确哈萨克族为唯一原住民、优势和主导群体,同时把拒绝哈萨克化的群体完全排除在“国家民族”(state-nation)边界之外,将其边缘化为“客居”在国家之中的少数群体;二是公民民族主义的“哈萨克斯坦化”道路,即建立包容性更强的“哈萨克斯坦族”认同,扩大其国家民族的边界以包容非哈萨克族群体,同时允许哈萨克族和少数群体之间以一种存在模糊边界的形式共存。

四、结 语

本文通过梳理哈萨克斯坦的国族建构道路发现,它在现实中的民族化(nationalization)却远非科恩二分法可以解释。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我们发现哈萨克斯坦尽管大体经历了“哈萨克化——哈萨克斯坦化——再度哈萨克化”的路线摇摆,但同时,在不同的时段内,这种民族化的过程也充满了争议与流动性。例如,1993年哈萨克斯坦最初通过的宪法实际上远比1995年的新宪法更加“公民民族主义”,^④也就是说,在最初时刻的哈萨克斯坦国家就有公民民族主义的构想,但可能出于更多现实政治的考虑,最终被“哈萨克化”的族裔民族主义道路所取代。又比如,虽然在2004年以后,国家努力走上公民民族主义的道路,但社会中一直存在大量的争议,可谓同时存在两种国族建构道路的交织和博弈。尽管民族主义二分法有其无可替代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洞见,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国族建构的不同范式与特点,但不论是此前学者已经分析过的欧美各国情况,还是本文做列举的新兴民族国家哈萨克斯坦的国族建构道路,我们都可以发现这种二分法在具体国族建构的复杂过程中常常变得模糊而失范。如何应对公民时刻都在进行的日常投票和政治表达,在内政外交和社会现实中随时因应调整、把握微妙的平衡,将是民族国家的国族建构取得成功的关键。在此过程中,科恩二分法在现实中已被超越。

〔责任编辑 马俊毅〕

① 艾山江·阿不力孜:《哈萨克斯坦独立后民族认同的架构历程探析》,《西北民族研究》2016年第3期。

② 吴宏伟、张昊:《部落传统与哈萨克斯坦当代社会》,《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4年第6期。

③ R. Brubaker, "National minorities, Nationalizing States, and External Homelands in the New Europe," *Daedalus*, Vol. 124, No. 2, 1995.

④ O. Kesici, "The Dilemma in the Nation-building Process: The Kazakh or Kazakhstani Nation?" *Journal on Ethnopolitics and Minority Issues in Europe*, Vol. 10, No. 1, 2011.